

◎ 赵敏俐 编著

文学研究 方法论讲义



(第二版)

學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教材
北京市高层次人才计划资助项目成果

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

(第二版)

赵敏俐 编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 / 赵敏俐编著. —2 版.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 - 7 - 5077 - 3739 - 4

I. ①文… II. ①赵… III. ①文学研究 - 方法论 IV. ①I06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2783 号

出 版 人 : 孟 白

责任编辑 : 刘 丰

出版发行 :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79

网 址 :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 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 保定金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 850 × 1168 16 开本

印 张 : 20. 25

字 数 : 53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8. 00 元

目 录

导论 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提出与课程设置	(1)
一、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提出及其意义	(1)
二、文学研究方法论课程的开设及相关介绍	(3)

上 编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概述

第一章 20 世纪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方法论意义	(7)
一、中国古代的“文”与“文学”观念	(7)
二、“五四”前后关于“文学”概念的科学探讨	(8)
三、文学观念的变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10)
第二章 20 世纪初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16)
一、对清人治学方法的简单总结	(16)
二、20 世纪初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18)
三、以进化论为指导的考证法的历史局限	(21)
第三章 20 世纪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主流	(24)
一、分析主义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24)
二、社会分析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	(26)
三、形而上学与社会学分析法的历史局限	(33)
第四章 20 世纪后期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新发展	(35)
一、文学研究方法论热的产生及历史渊源	(35)
二、以文化学为基础的系统方法论的发展趋向	(37)
三、20 世纪末方法论热的消退及相关思考	(41)
第五章 有关文学研究方法论著作简介	(43)

下 编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经典论文选讲

第一讲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53)
-----------------------------	------

参考篇目：

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策制度》（《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上册，2000）

饶宗颐《从郭店楚简谈古代乐教》（《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文物》1984年第8期）

谭家健《〈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它》（《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

张锡厚《关于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整理的若干问题》（《文史》1982年第15辑）

赵敏俐《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前沿》第2辑，2000）

第二讲 王国维：《人间词话》 (62)

参考篇目：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朱光潜《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叶嘉莹《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蒋寅《境·境界·意境——“意境”概念的古与今》《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增定本，中华书局，2009年）

左东岭《从良知至性灵——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

第三讲 梁启超：《情圣杜甫》 (72)

参考篇目：

钱穆《龚定庵思想之分析》（《国学季刊》第5卷第3号，1935）

李长之《文学史上之司马迁》（《文潮月刊》第一卷第5、6期，1946）

林庚《诗人李白》（《光明日报》1954年10月7日）

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

章培恒《〈洪昇年谱〉前言》（《洪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侯思孟《曹植的神仙思想》（《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第四讲 梁启超：《汉魏时代之美文》 (79)

参考篇目：

陈仲子《苏李诗辨证》，（《学灯》，1924年4月30日至5月1日）

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1930年第1期）

古直《汉诗研究·古诗十九首辨证、苏李诗辨证》（启智书局，1933）

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考证》（中华书局，1955）

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赵敏俐《论班固的〈咏史诗〉与五言诗发展成熟问题》（《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

第五讲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98)

参考篇目：

-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刊印，1945）
王 瑶《文人与药》、《文人与酒》（《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王水照《北宋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第六讲 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 (105)

参考篇目：

- 陈寅恪《长恨歌笺证》（《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
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文学年报》1932年第1期）
唐圭璋《云谣杂曲子校释》（《文史哲季刊》1943年第1卷1期）
高 亨《周代大武乐考释》（《文史述林》，中华书局，1980）
沈祖棻《阮嗣宗〈咏怀诗〉初论》（《国文月刊》1948年第65期）
邓小军《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陶渊明〈述酒诗〉补正》（《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

第七讲 吴 梅：《顾曲麈谈·原曲》 (118)

参考篇目：

- 孙楷第《元曲新考》（《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
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文学年报》，1932）
钱南扬《宋元南戏考》（《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
向 达《敦煌俗讲考》（《燕京学报》1934年第16期）
王季思《元人杂剧的本色派和文采派》（《学术研究》1964年第3期）
陈 多《戏史何以需辨》（《戏史辨》，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第八讲 胡 适：《红楼梦考证》 (139)

参考篇目：

-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卷11，中华书局，1959）
浦江清《屈原生卒年月日的推算问题》（《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钱 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燕京学报》1928年第7期）
孙 望《王度考》（《学术月刊》，1957年第3期）
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陈贻焯《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唐诗论丛》，1980）

第九讲 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173)

参考篇目：

- 胡念贻《关于〈诗经〉中大部分是否民歌问题》（《文学遗产增刊》1959年第八辑）

屈万里《论〈国风〉非民间歌谣的本来面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1963）

顾颉刚《论诗三百篇所录全为乐歌》（《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郭沫若《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

闻一多《说鱼》（《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褚斌杰《〈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褚斌杰《古典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第十讲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193)

参考篇目：

浦江清《八仙考》（《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游国恩《论陌上桑》（《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

冯沅君《古优解》（《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董每勘《说“傀儡”》（《董每勘文集》，广东高教出版社，1999）

郑振铎《净与丑》（《中国文学研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

第十一讲 郑振铎：《汤祷篇》 (222)

参考篇目：

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苏雪林《〈九歌·河伯〉与古代河神祀典之关系》（《现代评论》第204期）

孙作云《诗经恋歌发微》（《文学遗产增刊》第5期，1957）

桀溺《牧女与蚕娘——论一个中国文学的题材》（《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傅道彬《兴与象——关于原型的古老诠释》（《晚唐钟声》，东方出版社，1996）

第十二讲 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235)

参考篇目：

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傅璇琮《闻一多与唐诗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王水照《苏轼豪放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期）

黄天骢《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罗宋强《我国古代诗歌风格论中的一个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第十三讲 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 (240)

参考篇目：

游国恩《屈赋考源》（《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一卷三号，1935）

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新亚学报》三卷一期，1957）

郑振铎《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郑振铎全集》第四卷，花山文

艺出版社, 1998)

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 1923)

第十四讲 吴 宓:《诗学总论》 (250)

参考篇目:

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30年第2本第2分本)

尧子《读〈西厢记〉与 Romeo and Julie》(《光华大学半月刊》第四卷第2、3期, 1935)

吴熊和《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中华文史论丛》1992年第50辑)

叶维廉《道家美学、中国诗与美国现代诗》(《中国诗歌研究》2003年第2辑)

曹旭《诗品东渐及对日本和歌的影响》(《文学评论》1991年第6期)

王小盾《越南俗文学文献和敦煌文学研究、文体研究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第十五讲 朱自清:《诗言志辨·比兴》 (258)

参考篇目:

郭绍虞《六义说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1期)

张振泽《〈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文学遗产》, 1983年第3期)

赵沛霖《兴: 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的积淀》, 《天津社会科学》, 1985年第5期)

周英雄《作为组合模式的“兴”的语言结构与神话结构》(edited by John J. Deeneyed. Chines-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and Strategy P51 - 78 Hong Kong, 1980)

鲁洪生《从诗经赋比兴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其本义》, 《中国社会科学》, 1993年第3期)

第十六讲 朱光潜:《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279)

参考篇目:

程千帆《中国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程千帆全集》第八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王运熙《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乐府诗述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高友工《律诗美学》(《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宇文所安《情投“字”合: 词的传统里作为一种价值的真》(《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曾永义《元杂剧体制规律的渊源与形成》(《台大中文学报》1989年第3期)

吴相洲《论永明体的出现与音乐之关系》(《中国诗歌研究》2002年第1辑)

第十七讲 杨公骥：《〈商颂〉考》	(287)
附录：赵敏俐《慎思明辨的学术典范——杨公骥〈商颂考〉评析》	(300)
参考篇目：	
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导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许志刚《〈诗经〉与周代的礼乐文化》（《诗经论略》，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曲德来《屈原生平诸问题》（《屈原及其作品新探》，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	
姚小鸥《公莫巾舞歌行考》（《历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	
后记	(314)
再版后记	(315)

导论 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提出与课程设置

随着当代学科建设的日趋分化,中国古代文学已经成为文学这一学科下一个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何持续不断地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使之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丰富的内容参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已经是学者们早就思考的重要问题。同时,随着高等院校研究生教育的大发展,要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研究型人才,使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基本知识,而且具有学术创新能力,也是当前大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正是在这一大的文化与教育背景之下被提了出来,它成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研究生教育所急需。因此,在高等院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培养中开设“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课程,并编写一部与之相配套的教材,自然就有了它的多重意义。

一、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提出及其意义

严格讲来,只要我们研究文学,就要有一定的方法。所以,方法与研究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在中国古代,孟子曾提出过“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之说,这虽然不是就文学而言,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却是最早形成的基本方法。《毛诗》学派在研究《诗经》时曾提出了“风雅正变”之说,这也是在一种研究方法上得出的结论,或者说它里面就体现了一种研究方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列“原道”、“征圣”、“宗经”、“辩骚”、“正纬”五篇,并认为这是为文之枢纽,其实这也是刘勰研究“文”所坚持的基本方法。中国古代学术有汉学、宋学、清代朴学之别,又有所谓义理之学、考证之学、辞章之学之别,这其实也包含着研究方法论上的差别。

但是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提出方法论的问题,自然还是20世纪初开始的事情。就我所知,首先把它当成一门课来讲,应该始于梁启超。他于民国10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一学期后集成一书,名之曰《中国历史研究法》。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向来有文史不分之说,文学史的研究从广义上也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因而,此书中所讲的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具有同样指导意义。最早讨论文学研究法的著作当属姚永朴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研究法》一书。

1923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公开演讲时说:“古来之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① 王国维这种把纸上材料与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考古发现之新材料结合运用的研究方法，被人称之为“二重证据法”，在20世纪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由此，可见当代人对于方法论问题之重视。梁、王、陈诸人在学术界的影响，不仅在于他们本身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同时包括他们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给后来者的巨大启示。

具体到文学领域，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人发表有关研究方法的文章，如渭川的《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见1923年《学生杂志》第10卷第7期）；仲云的《一种研究文学史的新方法》（见1924年6月2—9日《学灯》）；30年代，李长之的《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现代》第5卷第3期）等。50年代，在如何编写文学史的大讨论中，关于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进入8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方法问题再度被提了出来，并先后出版了多部与之有关的著作。如王钟陵的《文学研究新方法论》、钟优民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周勋初的《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张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等书，以及叶维廉的《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略论》等文章。由此可见方法论问题的重要以及学人们对它的重视。

方法论，严格来讲应该属于哲学的范畴。所谓文学研究方法论，也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寻找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要寻找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我以为首先要认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的时代对于“文学”的定义是不同的。“文学”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其中有“文学：子游子夏”之语，意思是说在孔门弟子中，说到“文章博学”，当属于游、子夏。可见这里所说的“文学”，指的是学问渊博。到了秦汉时代还沿用这一概念，并且将学问渊博的人称之为“文学”。其实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一个与现代的“文学”完全相对应的概念，直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作《国故论衡》，首先为“文学”正名，他这样讲：“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可见，在章太炎看来，“文学”应该是一个词组，包括“文”与“学”两个部分，“文”指经史子集等所有写在竹帛上的文献，“学”则是指那些得以为文的“法式”、“文学”合在一起，指的是对所有文献的学习与研究。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则是“五四”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新概念。^②由于对它的定义不同，相应的“文学”研究对象自然也会跟着改变。第二是“什么是文学研究”的问题，这是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一层面中，我们首先要认识的是在“文学”研究中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达到什么目的。根据要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的，我们自然会选择不同的理论工具，如历史唯物论、心理分析、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原型批评等等。这些不同的理论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思想武器，正确地使用各种理论，是我们解决问题、达到文学研究目的的基本途径。第三是如何对它进行研究的问题，也就是具体的方法问题。如搜集资料、整理、考辨、运用史料的方法；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假设与证明等逻辑学的方法；以及宏观与微观、系统与分类、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等哲学辩证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前提，无论进行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离开。以上三个问题的解决，既与各种哲学思潮与文学研究理论的发展有关，又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与研究者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相联系。我们常说，一时代有一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详细讨论。

代之文学。其实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每一个时代的学术，都是在一定的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也都是在这一特定的时代研究方法下进行的。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文学研究方法论，首先要认清这一点，然后才是为自己寻找一种新方法的问题。

方法是研究的工具，由于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目的不同，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世上没有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开所有的锁，也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在所有的文学研究中都适用。当我们对文学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时候，用考据学的方法显然行不通。要认识作者所处的时代，原型批评的方法也不适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方法论，而不仅仅是方法。除了要掌握具体的研究方法之外，我们还要在“论”的方面下工夫。这里所说的论，就是通过学习和实践，发现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找到切实有用的研究方法。但同时，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中，又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如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的原则。科学的首要目的是求真，这是永不改变的。

二、文学研究方法论课程的开设及相关介绍

本门课程的讲授对象主要是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和刚入学的博士研究生，是为了让研究生在进入学术研究之前就懂得方法论的重要性，学习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知识，了解什么是文学研究方法论，方法论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如何自觉地利用各种研究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等等。具体来讲，全部讲课内容又分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是了解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以及其与时代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是对 20 世纪优秀学者的经典性学术论著进行方法论分析，了解现当代著名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所使用的不同方法以及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中尤以第二部分为学习和讲授的重点。

我之所以要把第二部分作为学习和讲授重点，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目前学术界有关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著作已经有多种，相关的文学理论著作和哲学著作更多。这方面要讲述的内容其实是很丰富的。但是，方法论本是一门抽象的理论，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用来指导实践。如果脱离了实践而讲方法，这方法就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所以，对于这些研究方法论的相关著作，我只做一般性的简单介绍，提供学习书目，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课外阅读。而我则把本门课的重点放在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来讲述方法上面，仔细分析每一个科研案例，看它们究竟使用了何种方法，又是如何使用的，才会让同学们真正理解方法论的内涵。第二，对于硕士研究生来讲，他们正处于研究入门的学习阶段，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研究实践，对于治学的甘苦还没有什么体会，只讲方法而不讲作品，他们照样不能体会每一种方法论的要义。而对刚入学的博士研究生来讲，他们面临着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同样需要在方法论实践上的指导。因此，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来讲方法论，也是本人在几年来讲授这门课程中总结出来的一点经验。

本讲义中所选录的，都是 20 世纪以来著名学者的经典性著作和论文，共分为十七讲。每讲选讲一篇正文，同时提供 5 篇以上的参考篇目。在选录的过程中，我力求每篇正文都代表一种方法，或者在学术研究中代表某一个方面。正文的入选作者均是 20 世纪以来某种研究方法或研究方向上的开创者，在相关的学术领域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像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更是公认的学术大师。参考篇目也大都选取本领域内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论著，这里既有老一代学者的文章，也有中青年学者的文章，同时也选录了港台、海外学者的部分文章，以显示其内容的多样性。正文与参考篇目之间，或者有方法论意义上的联系，或者在研究对象方面有某种联系。通过正文和参考篇目，我们可以看出某种方法在 20 世纪演进的历

史和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告诉同学们，方法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面对大致相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人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通过正文与参考篇目的学习，让同学们对于 20 世纪的学者们的治学与研究方法有所了解，对于 20 世纪方法论的演进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也有所熟悉，初步掌握运用方法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是想让同学们通过正文和参考篇目的学习，了解 20 世纪的学术发展历史，了解 20 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都取得了哪些突出的成绩。因为无论正文和参考篇目中所选的文章，都是一个世纪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都是每一个有志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读的论著。对这些经典性论著的学习，本身就应该成为研究生的一门必修的学业。

鉴于本课程的特殊性质，在讲授的过程中我也试图采用比较灵活的方式。它大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是老师对基本问题的讲授，第二是老师与同学们一起对经典性学术论著的研读和讨论。在研读和讨论之前，我要求学生们事先做好准备，要注意准备和解决以下问题：①对每篇文章的作者其人、其事要有一个初步了解；②本篇文章是在何种背景下展开研究的（包括前人的研究动态，作者写作此文的学术动机、目的，当时的学术环境、学术思潮等）？③本篇文章的精义在何处，主要学术贡献是什么？④文章主要运用了哪些方法和理论，以哪种方法与理论为主？⑤作者的学术理念是什么？其学术思想有哪些特点？⑥本文中主要使用了哪些材料，材料出自何处（包括正史、野史、会要、年谱、笔记、文集、青铜器铭文、甲骨文、简帛、图片、碑刻、各种现存实物、考古实物、田野调查、录音、录像等等）？⑦本篇文章在写作上有哪些特点，语言风格如何，体现了什么样的学术风格？⑧本篇文章有哪些不足之处？等等。在课前准备的基础之上，每一次选择一篇经典范文，由一位同学主讲，然后同学们集体讨论，再由老师总结。为了使讨论能够充分展开，除了主讲的同学之外，我要求所有的学生在课前必须认真研读每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种学习方式还是比较好的，首先，上课的过程就是经典范文学习的过程，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学术大师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知识。其次，它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每一篇范文的研讨，既是同学们的知识学习，也是一次登上讲台的实践。最后则让学生进行一次严格的学术论文的写作训练。

总之，我的目的是，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既要让学生们了解 20 世纪文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进展，又要让他们了解前辈学者不同的治学方法和各自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既要让这门课程成为一门理论课，又要让它成为一门实践课；既要让学生们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理论认识起点，又要让他们养成不尚空谈的严谨务实的学风。其实，这不仅是对学生们学习这门课程的期待，同时也是我自己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虽然已经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多年，但是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仍然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探索。每一次回顾前辈大师的学术事迹，重温他们的经典性研究文章，就深感自己的不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他对孔子的敬仰之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觉得这话很能表达我对人生的最高的治学境界的渴望，也很能表达我对前辈学术大师们治学成就的敬仰，同时也愿意用它来与同学们共勉。

上 编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概述

第一章 20 世纪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方法论意义

要讨论文学研究的方法，首先要搞清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要对它进行明确的界说并不很容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它会有不同的理解；而在这种不同理解的背后，则蕴涵着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潮。因此，一种文学观念的改变，也往往是一个时代学术思潮变革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研究方法变革的基础。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正是建立在“五四”前后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这一基础之上的。站在又一个世纪之初的今天，当我们在讨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时候，首先来看一看 20 世纪之初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讨论，对于深化新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好文学研究方法论这一门课，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中国古代的“文”与“文学”观念

要探讨 20 世纪学人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我们先应该回顾一下中国古人的文学观。“文学”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一语中。这里所说的“文学”，本是孔门四科之一，它指的是文章博学，即对所有文献经典的学习。文学这一意义，在汉代还在沿用，如《汉书·武帝纪》元朔十一年诏曰：“选豪俊，讲文学。”至于略近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概念，古代则单称之为“文”。“文”字在甲骨文中写作“𠂔”、“𠂔”，其字形“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文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①《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广雅·释诂》曰：“文，饰也。”是文的本义，指文采和文饰。《说文》和《广雅》两书正好从形象和功用两个方面对此字做了完整的解释。因为其本义指人胸部纹饰，故此字一出现就带有审美意义，在甲骨文中“冠于王名之上以为美称”。^②由此引而申之，“文”字可指一切有文采的东西。《周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又曰“五色成文而不乱”。故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由此可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了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形式上的审美艺术特色，由日月垂象的天之文，山川焕绮的地之文，以及傍及万品的动植皆文，推而广之到人心感于物形于语言的声音，见诸文字的表现，就是人之文。

中国人虽然很早就认识了文学的这种艺术形式美，可是却没有将文学当做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因而形成一种泛文学观，把凡是人类用语言文字写成的东西都称之为文学。

^① 见董作宾：《小屯·殷虚文字 2 编》六八二〇；郭沫若等：《甲骨文合集》三六五三四。

^② 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96 页。

为“文”，所以，在号称体系最为完备的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里，它所论述的“文”除了我们今天可称之为文学的“诗”、“乐府”、“赋”等三类之外，还包括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17类，这些，大都不能算在今日我们所说的“文学”之列。

也许，古人对于这种关于“文”的提法也觉得过于宽泛，故六朝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直至清人阮元，仍坚持这一说法，把无韵者称之为“直言之言，说难之语”，把有韵者才称之为“文”，并把传为孔子所作的《周易·文言》一篇看成是千古文章（文学）之首。但是这里的“文”仍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我们所说的“文学”。

正因为古人持这种模糊的文学概念，所以也就不能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一学科。尽管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千百年来仍然不断地进行着文学创作，并继续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但是直至辛亥革命前，中国学者心中的“文学”还是一个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概念。在这个时期，由于受外国学术的影响，中国人也开始了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代表作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辜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但由于当时中国人对“文学”这一概念并没有进行现代化的梳理，所以他们的文学史仍是一个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体系。

二、“五四”前后关于“文学”概念的科学探讨

随着历史与科学的进步，20世纪的中国学人显然不会再把自己的研究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中。在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感召下，自20世纪初开始，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了关于文学观念问题的新的思考。

在这一思考过程中，王国维显然是个开风气的人物。他在《国学丛刊序》中说：

学之义广矣，古之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法理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待之结果而已。

由这段话看，王国维显然深受现代西方学术的影响，试图要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从科学、历史与文学的差别角度给文学下一个定义。尽管他给文学下的这个定义还不明确，应该说，这种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从思想深度上看是远远超过了章太炎的。

在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中，王国维之后，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谢无量。1918年，谢无量出版了《中国大文学史》，在这部书第一篇的绪论中，第一章的题目就是“文学之定义”，在这里，他首先考察了“中国古来文学之定义”，又考察了“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义”，最后他认为，在中外学者中，只有英国学者庞科士（Pancoast）在他的《英国文学史》中所下的定义最好：

文学有二义焉。（甲）兼包字义，统文书之属，出于拉丁语 *littera*。首自字母，发为记载，凡可写录，号称书籍，皆此类也，是谓广义，但有成书，靡不为文学矣。（乙）专为述作之殊名，惟宗主情感，以娱志为归者，乃足以当之。文学虽不规规于必传，而

不可不希传，故其表示技巧，同工他艺。知绘画音乐雕刻之为艺，则知文学矣。文学描写情感，不专主事实之智识。世之文书，名曰科学者，非其伦也。虽恒用历史科学之事实，然必足以导情陶性者而后采之。斥厥专知，擷其同味，有以挺不朽之盛美焉。此于文学，谓之狭义，如诗歌、历史、传记、小说、评论等是也。^①

这是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学研究著作中第一次明确地表示接受外国人的文学定义，但这种接受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同中国传统的文学观以及外国诸多文学观之中的择善而从，这里实际已经包含着他们对于文学本质的理性思考。尽管谢无量在这里还没有提出自己的文学定义，他的《中国大文学史》中还包括经学、文字、史学方面的东西，可是他毕竟强调了文学导情陶性的方面，特别指出了对文学要做“精神上之观察”，要注意文学的“美的特质”，这样明确的理论主张，比起王国维来又有了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五四”学人对文学的本质问题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探讨。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的文章，就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理性的思考。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现在我们常常听得‘文学！’‘文学！’‘保全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声浪了。但是什么是文学呢？不但读者心里常常有这个疑问，就是我心中也常常有这个疑问。我去问保全旧文学的人，他说：‘文学就是文学，何须你问。’我去看创造新文学的书，书里也还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于是，他就先看一下中国古人是怎么说的，为此他查找了桓谭、应璩、陆机、李充以至刘勰和章学诚的文章，结果发现谁也不曾“爽爽快快地下一条文学界说”，原来“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浑浑沌沌，不愿有个明了的观念”，勉强地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想给文学以一个明确界说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阮元，一个是章太炎。阮元说“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章太炎的说法已如上述。这些，显然也是比较宽泛比较模糊的，是罗家伦所不满意的。于是，他又广泛搜集了西方15家不同的说法，概括归纳，指出文学有以下八种要素：（一）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同批评；（二）最好的思想；（三）想象；（四）感情；（五）体裁；（六）艺术；（七）普遍；（八）永久。最后他终于“用科学的方法，归纳出一个界说”：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集此众长，能使人类普遍心理，都觉得他是极明了，极有趣的东西。^②

罗家伦给文学所下的这个概念，在今天看来也许还不是那么完善，但是他为了做到这一点，却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并对古今中外五花八门的文学概念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梳理和细致的分析，体现了“五四”学人那种求是科学的研究精神，它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开始从传统走进了现代，当代人的科学精神在文学研究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以概念的界定为基础，说明一种新的学术规范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也必将由此而开始诞生，它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在“五四”时期关于文学本质的探讨中，郑振铎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文学的定义》是另一篇重要的文章。和罗家伦不同，郑振铎并不是在总结别人关于文学定义的基础上

①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第4页。

② 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新潮》1919年第2期。